

中国边疆
史地文丛



江山多娇

抗战时期的
边政与边疆研究

JIANGSHAN
DUOJIAO

孙喆 / 著

KANGZHAN SHIQI DE
BIANZHENG YU BIANJIANG YANJIU



CIS | 岳麓書社

文史知识

江山多娇

抗战时期的
边政与边疆研究

JIANGSHAN
DUOJIAO

孙喆 / 著

KANGZHAN SHIQI DE
BIANZHENG YU BIANJIANG YANJIU

CSS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山多娇:抗战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孙喆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5.1

ISBN 978-7-80761-874-4

I. ①江... II. ①孙... III. ①边疆地区—行政管理—
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D69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0999 号

JIANGSHAN DUOJIAO KANGZHAN SHIQI DE BIANZHENG YU BIANJIANG YANJIU

江山多娇:抗战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

作 者:孙 喆

责任编辑:胡宝亮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谢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http://lzfts.tmall.com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8.25

ISBN 978-7-80761-874-4/D·14

定价:48.00 元

承印: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序

马大正

孙喆同志送来新著书稿《江山多娇：抗战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嘱我为之序。面对这位相识已有二十年的小字辈才俊，实在是难以“抗命”！因为，我曾参加她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并有幸担任了答辩委员会主任，从这一意义上说，我算是半个老师，这是其一；其二，近十年来我们曾一起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共事，从这一意义上说，我算是同事，或者说是半个领导；其三，二十年来我们曾一起参加过多次学术会议，孙喆专攻清史，尤其是清代边疆史，近年又将研究重点延伸至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史和边疆研究学术史，并多有成果面世，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是研究中的同行，只是她在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可持续发展的后劲，让我追赶之不及，自叹不如。

基于此，我放下手头工作，埋首览阅了孙喆的新作，从学术角度留下印象有三，写出来愿与作者和读者共享。

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截至20世纪上半叶，在内忧外患的压力和寻求强国富民的动力交相推动下，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两次研究高潮，即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以西北史地学兴起为标志的第一次高潮，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以边政学出现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高潮。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不但面临严重的外患，而且内忧深重。如何挽救岌岌可危的边疆局势，打破边疆和内地的隔阂，团结各族力量抵抗外侮，

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中国边疆研究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在这轮高潮中，涌现出众多的学者、刊物和研究机构，中国边疆的整体研究和区域性研究成果纷纷出现，几乎遍布 20 世纪前 50 年间，其中又以 30、40 年代最为集中。同时，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向一门现代学科演进。而以 1937 年抗战全面开始及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界点，第二次研究高潮又可分为两个阶段。本书即是以高潮的第二阶段为主要着眼点，在参考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历史资料进行了仔细梳理，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思路，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这应该是目前学术界专门研究抗战时期边政和边疆学术史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二、就总体内容而言，本书紧紧抓住民国时期边疆治理和边疆研究学术史两个命题展开研究。在边疆治理史方面，抗战爆发后，在严峻形势的逼迫及社会各界开发边疆、改革边政的强烈呼吁下，国民政府强化战时边疆治理的政策及措施陆续出台。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边疆的治理虽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 30 年代的施政理念和方针，但由于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的突变，还是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和特点。本书对抗战前后的边疆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变化，认为虽然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各项边疆政策及举措并未触及占人口最大多数的边疆地区底层人民的生活，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边疆社会的落后状况，但对保证抗战时期边疆地区的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团结各族民众以及开发建设边地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作者的这一结论从历史实际来看，是较为客观公允的，同时，国民政府所遭遇的困境及其采取的应对措施对我们今天治理边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价值。在边疆研究学术史方面，本书对抗战时期的边疆学术研究状况、趋势和特点进行了探讨和总结，指出：在学术传承和政策导向的双重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不仅延续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势头，而且再次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涌现出大批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刊物及团体，各种边疆、民族考察活动层出不穷。边疆研究开始逐渐从传统的史地范

序

畴向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拓展，研究视野、范围、方法不断丰富和扩大，日益成为一门综合化的学问，加之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得这一研究在学术趋向上出现了合流的态势，分工合作渐成为学人共识。边政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学科由此而雏形初现。

三、作者的研究视野并非只局限于民国时期，而是将中国边疆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全局之中，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与研究，突出体现了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边疆学构筑大命题下中国边疆研究发展趋势与特点，对中国边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的构建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并给人以启迪。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宏观叙述和微观研究的关系上，例如在对国民政府边疆治理问题的探讨上，囿于中国边疆地域的广阔性和差异性，本书还是以宏观论述为主，不够具体细致，如果能再增加一些个案研究的内容，叙述当更为生动，论证亦更加充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缺憾也为作者和其他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索的思路和空间。

我寄望于孙喆同志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也希望并呼吁有更多的学者投身到中国边疆研究这个既传统又年轻的学术领域中来，共同推动它的深化和拓展，完成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筑，更好地服务于现实需要，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尽学人的绵薄之力。

是为序。

2014 年 3 月 22 日

于北京自乐斋

目 录

绪论	1
一、背景及缘起	1
二、研究现状	6
（一）关于边政学的形成	7
（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边疆的治理	9
（三）抗战时期中国边疆研究	17
第一章 统一与“自治”：抗战前夕的边疆危局	19
一、东北沦陷	20
二、内蒙古“自治”	22
三、康藏纠纷	29
四、班禅回藏	32
五、新疆事变	42
六、班洪事件	54
第二章 “无实力则需有政策”：1928—1937 年国民政府 治理边疆的思想和政策	59
一、同一国族、统一国家	60
二、以三民主义治边疆	67
三、从刚性实力政策到羁縻	70

四、扶植边疆地区僧俗上层人物·····	83
（一）建立蒙藏回疆地方长官及宗教领袖进京展觐制度 ·····	83
（二）优容十三世达赖·····	85
（三）扶持九世班禅·····	88
五、开发边疆·····	93

第三章 抗战与建国并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和实践····· 107

一、扩充蒙藏委员会机构建制·····	108
二、加强对边疆地方的管理与控制·····	110
（一）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110
（二）加强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等机构的作用·····	112
（三）实现对新疆的直接管辖·····	120
三、确立国民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权威地位·····	130
（一）颁布喇嘛管理条例·····	130
（二）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之寻访与征任·····	135
（三）九世班禅转世灵童之寻访与征任·····	144
四、全面开发西北和西南·····	149
（一）西南：抗战的根据地·····	149
（二）西北：建国的根据地·····	157

第四章 “俾尽书生报国之志”：两大边疆研究会在战时的活动····· 174

一、顾颉刚在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	175
（一）抗战初期对西北的考察·····	175
（二）在大后方时期的边疆研究·····	186
二、新亚细亚学会在抗战时期的活动·····	200

目 录

(一) 学会恢复与月刊复刊	201
(二) 月刊复刊后的研究内容	204
三、延续和发展：以中国边疆学会为例	210
(一) 三会合一	211
(二) 编纂丛书与发行期刊	216
 第五章 “一体”与“多元”：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双重 内涵	227
一、抗战时期的中国民族学会	227
(一) 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与发展	228
(二) 中国民族学会与边疆民族研究	231
二、一门新的学科——边政学的出现及边疆研究的整合与 多元发展	240
(一) 边政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	241
(二) 边政学体系下边疆研究的整合与多元发展	245
三、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之矛盾性	258
 参考文献	267

绪 论

一、背景及缘起

自晚清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出现空前严重的边疆危机。进入 20 世纪以来，边疆危机不仅未能纾解，反而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河山大好，化为修罗之场；黎庶无辜，尽成刀俎之肉”^①。国民党在 20 年代末虽然宣告完成全国统一，但中央与各地军阀之间、军阀与军阀之间争夺地方控制权的斗争依然连绵不绝，中央对边疆各地的控制和治理举步维艰、步履蹒跚；同时，由于边政经年失修，边疆社会矛盾丛生，民族隔阂严重，西方列强的觊觎之心和侵略气焰日益嚣张。与晚清相比，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边疆局势更为复杂严峻，完成并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和打击边疆地区分裂成为摆在国民政府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政策和措施陆续出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边疆危机再次掀起高潮。如时人所言，事变

^①林竞：《西北丛编·自序》，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 年。

前，远东均势未破，各列强对中国之侵略尚存猜忌之心，虽于暗筹谋策划，但表面上仍不得不维持“领土完整”“机会均等”之原则，“对吾锦绣河山，不无垂涎三尺，然各有戒心，尚不敢犯众怒以为戎首也”，而至事变发生，“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夺吾东北四省，《九国公约》上门户开放之原则，摧残殆尽。远东之均势既迫，于是各国纷起效尤，对于领土之侵略，更明目张胆，不复有所顾忌。法占九岛，英窥班洪，既啖南疆独立，又助藏军内犯，一时山雨欲来，风云变色。一八九八年瓜分之局势，殆将复见。”^①此后，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接踵而至，继东北之后，内蒙古大部、华北、华中、华南、东南沿海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军之手，中国进入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时期（本书后文之“抗战”，均指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全面抗战）。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被迫全部移驻重庆，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地位开始正式确立。

抗战开始以后，特别是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号召和团结各族共同抗日保住半壁江山并逐渐收复失地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由此“边疆问题颇为社会人士注意。有识之士更群起急呼‘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于是边疆的建设工作，乃成为抗战建国期中一个重要的工作。”^②而“西南西北各边省，不徒为我祖宗发祥之地，抑亦国防之屏障，物资之渊藪，惟以交通梗阻，语文隔阂，所谓边疆，几同瓯脱，地旷人稀，文献残缺。甚至言边事者，反须问津于外人，耻孰甚焉……及东北沦陷，首勤远略，筹边经国，日不暇给。国人亦感怀于边省之不可忽。此民族觉悟之一大转机。”^③国人对边疆的内涵和重要性也有了进一步认识，“边疆之重要，不独为国防的，而且具有经济的、人口的意

①凌纯声等著：《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编者序言》，1页，南京：中正书局，1934年。

②吴鼎：《边疆教育之现况及今后推进之方法》，《边政公论》第1卷第2期，1941年9月。

③高长柱：《边疆问题论文集·张群序》，1页，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初版。

味”^①。“边疆不仅是国家之屏藩，并且是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因为他在地势上与外国土地相接界，所以他的一切建设，应该比内地部分更为重要。过去一般人鉴不及此，以为边疆乃边隅之地，一切建设可以从缓，因而不甚加以注意，听其落后，于是‘我弃人取’，以致形成今日边疆问题之严重性。”^②这一时期对边疆的概念、内涵虽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当时人已经意识到，边疆的定义应兼顾政治、文化、经济、军事、民族、地理等诸种含义，方具有完整性。

随着边疆问题备受关注，对以往边政的检讨及对未来边政走向的讨论，成为当时社会一时之热点。如许公武提出“欲建设新中国，必不能忽略边疆建设，欲建设边疆，必自健全边政机构始”，“是在鉴往知来，因革损益，应时代之需要，以建立适宜之行政机构耳”，而“为今之计，似宜将蒙藏委员会改为边政部，扩大其管辖区域，明定职掌以一事权而应当前之需要”。^③梁瓿第则指出边政的实施范围须扩充，因边疆的内涵应有两种：一是陆疆，一是海疆。过去多强调陆疆，“居今日而论边疆，海疆实须包括在内”^④。

在抗战形势的逼迫及社会各界开发边疆、改革边政的强烈呼吁下，国民政府强化战时边疆治理的政策及措施陆续出台。总体而言，这些举措对保证抗战时期边疆地区的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团结各族民众以及开发和建设边地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从传统皇朝体系步入现代主权国家的重要阶段，它所遭遇的困境及采取的相应对策对我们今天治理边疆仍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边政问题不能不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边政”的概念，按当时人理解，“常指对于边区土人所施行

①梁瓿第：《边疆教育导论》，《贵州教育导论》第7—9期，1942年。引自汪洪亮、王晓安等编：《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18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

②吴鼎：《边疆教育之现况及今后推进之方法》，《边政公论》第1卷第2期。

③许公武：《调整边政机构之拟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④梁瓿第：《论边政制度的革新》，《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

之政治而言”^①，又或“指具有不同文化方式的民族的区域的政治……我们今日所谈的边政，应该是非汉语人民的政治”^②。本书在叙述边政问题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状况，采用的是广义内涵，即指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施政，其内涵包括政策、机构及各项举措，诸如国界之订立、边区之土地利用、边防之建设、移民实边等诸项工作皆包含在边政范畴之内。

抗战爆发以后，边疆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原来讥笑边疆工作者，现在也从事于边疆的考察，或者边疆的鼓吹了”^③。在学术传承和政治导向的双重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不仅延续了30年代的势头，而且再次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涌现出大批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刊物及团体，各种边疆、民族考察活动层出不穷。国人对边疆建设和开发不仅抱以极大热情，而且力图改变过去口号标语式的宣传方式，将各项政策真正付诸实践，“我们过去对于‘知’的工作，对于了解自己国情的工作太少了。就连人口、土地、资源等立国的基本要素，都没有大量的清楚资料，其他社会方面有系统的调查研究更缺乏了。时至今日热烈的情绪，坚强的意志，固属重要，而清明的理智，正确的判断，尤为重要。可是清明的理智，是从事实的了解产生出来的。从今日起，我们应该大觉大悟，再不要‘纸上谈兵’，再不要只做空洞而无内容的文章，再不要只在贴标语、喊口号上用功夫。这是自欺欺人，误国误民的行为，甚至等于犯罪，必须革除的。我们不需要离开事实太远的夸大，以及种种肉麻的虚伪报告”^④。在边疆危机空前激化的刺激下，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更加凸显了经世致用的功能。

同时，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开始逐渐从传统的史地范畴向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拓展，研究视野、范围、方法不断丰富和扩大，

①徐益棠：《边官边民与边政》，《边政公论》第7卷第1期，1948年3月。

②丁骥：《边政更张的一种看法》，《边政公论》第7卷第3期，1948年9月。

③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④李景汉：《《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

加之边疆问题的复杂性,使其日益成为一门综合化的学问。当时学者已经看到这一趋势,“我国边疆之研究范畴,既如是之广,决非一二专家或少数人士所能应付,亦非一二学术机关或大学所能担当,故如不能严密其组织,集中人才作分工合作,颇难期望此庞大事业之克底于有成也”^①。在此背景下,边政学作为专门研究边疆问题的一门学科而雏形初现。

“边政学”这一学科概念系由吴文藻首先提出,他认为,边政有广狭二义之不同。边疆政治,系边政之广义;边疆行政,系边政之狭义。他倾向边疆政治宜采用广义概念,即包含边疆行政、边疆政策等内容。“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通俗地说,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民的公众事物。用学术语,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② 吴文藻还强调,“欲使边政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端非专从边政学本身着想就可以竣事,必须设法与相关的科学,密切联系,始克有成”。他分别从理论社会科学与应用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其与边政学的关系,指出,在理论社会科学方面与边政学关系最深者,首推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其次,则为经济学、法学和教育学;又其次,则为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而在应用社会科学方面,边疆教育、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等领域的研究都与边政学有很大关系。此外,海外华侨社会的研究,亦可作为边政学的借鉴。总之,“学问之道,在研究时确须分门别类,而在实行时,都是息息相通的”^③。吴文藻试图将以往各领域的边疆及少数民族的相关研究统一纳入边政学的范畴之内,构建一门相对独立的专业化学科体系。尽管他认为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应该在边政学的研究上占主导地位,但从抗战时期边疆研究的总体状况来看,所呈现的却是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优势地位并未丧失,

①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

②③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1月。

同时一些新兴学科在蓬勃发展，新旧领域的研究交相辉映的景象。

本书的构思还得益于“《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研究”课题的研究^①，在这一课题的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我发现抗战时期的边政及边疆研究与30年代既有延续性，又有相对独特性：在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氛围下，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以自成体系，持续受到重视；边疆研究备受关注，成绩斐然，并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全面系统研究此一方面的论著并不多见。因此，近两年来，我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抗战时期边政及边疆学术史的研究上，希望能够就此形成较为独立、系统的研究成果。在研究途径上，本书主要以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入手，通过对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归纳，对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尤其是抗战期间的边疆政策、治边机构、边政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各界的边疆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探讨，试图较为客观地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此透视当时之边疆观、民族观及国家观的演变和发展，总结边政之得失。

二、研究现状

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边疆危机的不断深化，边疆问题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重视，在20世纪中期以前酝酿出两次较大规模的研究高潮，边疆研究逐渐向现代学科方向演进。其间，学者们整理了大量边疆史料，积累下来大批成果，奠定了我们今天边疆研究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研究领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相关研究

^①该课题已结项出版，见孙喆、王江著：《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成果也时有面世,研究正在有序推进。随着中国边疆研究的不断深化,从中国边疆研究史的视角,对上述两次研究高潮的演进脉络及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日益为学人重视,渐成研究的热点之一”^①。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起于20世纪20年代末,止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几乎涵盖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本书基本着眼于这一时段边疆问题的考察。拙作《〈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曾对当前学界于20世纪上半叶边疆学术史的研究状况予以了回顾;关于目前南京国民政府边政问题研究的总体状况,段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民族出版社,2012年)和《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中已做过较为系统、全面的叙述和总结。因此,本书在梳理相内容的学术史时,仅作择要述之。

(一) 关于边政学的形成

用“边政学时代”^②一词来概括20世纪上半叶边疆学术研究的特点,得到当今许多边疆领域研究者的赞同。例如,马大正指出,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以现代学术研究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全方位研究是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③汪洪亮认为:“边政学是近代中国第二轮边疆研究高潮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国化和本土化最为重要最具成效的学术领域,是中国边疆研究由传统学术范畴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学者首次将人类学、民族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有效尝

①马大正:《民国边政史料汇编·序》,1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②王铭铭:《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③《民国边政史料汇编·序》,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试。”^① 吴楚克在《中国边疆政治学》中指出，吴文藻创建的边政学“是对 20 世纪初历史地理学派和 20 世纪 30 年代‘禹贡’学派，从历史地理角度创建边疆学的一个科学的发展和极富远见的回应。尽管上述学派在某种意义上是边政学的萌芽和发展，但到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历史地理的研究越来越脱离十分紧迫的现实要求，已经不能直接为抗日救亡服务，于是从政治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边政学反映了这个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客观需要”^②。

另外，符雪红《20 世纪中国边政研究与边区开发理论述评》（《学术探索》2004 年第 9 期），罗崇敏《中国边政学新论》（人民出版社，2006 年），林超民《应对边疆危机的新学科——边政学的兴起与发展》（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汪洪亮《过渡时代的边疆学术：民国时期边政学研究引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段金生《试论中国边政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学科建设》（《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等成果，基本都将边政学范式的形成视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边疆研究最主要的时代特征，并各自从不同角度对边政学的内涵、特点、形成背景、发展脉络、学科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拙著《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与王江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亦承认边政学的提出不仅出于现实的需要，而且符合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在上至政府，下到个人，中间尚有大批社会团体、专业刊物等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了近十年时间后，一个外延和内涵相对清晰的专业化学科体系的建立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但是，以边政学

①汪洪亮：《过渡朝代的边疆学术：民国时期边政学研究引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

②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137—138 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年。